构建清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学术评论

政治视角与钱穆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张瑞龙

[摘要] 钱穆以宋学为坐标和价值尺度，评判和衡论清学。但我们往往从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纯学术角度来定义宋学和清学，误认为是从学术自身来论。实则在钱穆所谓的“宋学”中，政治居其半，本身已包含了从政治角度衡论清代学术思想的视角。钱穆认为“每转益进”是中国学术演进的正常法则，但清代学术思想却是“每转益退”。新发现的钱穆《论清儒》三个版本的文字异同，为此论断增添了确证。就清代学术思想研究中的政治视角而言，钱穆比章太炎更激进，使其成为从宋学论清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完成了学理上的建构，这就是宋学中极为重视的《春秋》夷夏之辨。

[关键词] 钱穆　清代学术思想　每转益进　政治视角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3）－01－0013－011

在20世纪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形成过各种解释清代学术思想变迁的说法，如“反满革命说”或“政治高压说”“理学反动说”“每转益进说”“思想启蒙说”“内在理路说”等。丘为君将这些说法总结为三个典范，即：梁启超和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①] 这一说法，在学界影响颇大，常见学者引据。[②] 葛兆光教授认为后两个典范可归为一类，称共有两种，即“理学反动”论和“每转益进”论。[③] 无论如何，他们都同意钱穆研究和解释清代学术思想史变迁的学说是“每转益进”。在这些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典范的总结中，“反满革命说”或“政治高压说”已失去了踪影。

事实真的如此吗？“反满革命说”是章太炎在清末基于反满革命的现实关怀提出的，称清代经学独盛是因满人统治的政治高压。这就是《訄书·清儒》中著名的“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之论。清亡以后，“反满革命”的现实意义已不复存在，章太炎删改《訄书》中

[收稿日期] 2022-10-20
[作者简介] 张瑞龙（1979—　），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2；zhangruilong08@ruc.edu.cn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资助”成果。

① 丘为君：《清代思想史“研究典范”的形成、特质与义涵》，《清华学报》1996年第4期，收入丘著《戴震学的形成》，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12-264页。

② 罗志田：《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5期。

③ 葛兆光：《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

的现实关怀之言，更名《检论》。但此说法却只字未变。① 此时再称之为“反满革命说”，显然已不符合历史实际，故称其为“政治高压说”或“政治视角”。实际上，它已成为 20 世纪上半期清学史论述的基本共识，并没有淡出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解释框架。②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视角也是钱穆研究和解释清代学术思想变迁的重要理论，他主张从宋学出发来研究和评判清代学术之高下的观念，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并且完成了学理上的构建，使之成为该学说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外在的背景、动因和现实关怀。政治视角不仅左右了钱穆对清代学术思想的基本定位和价值判断，也影响了后人对钱穆关于清代学术思想演变的正确认知，所谓“每转益进说”就是典型之例。

鉴于既有研究将钱穆的“每转益进说”置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典范地位，且忽视政治视角或“政治高压说”在此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本文先就钱穆“每转益进”说的提出及其运用于研究和解释清代学术思想的情况，仔细辨析，然后就政治视角如何影响钱穆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以及其在学理上的构建等详加论述。

简单说来，钱穆对清代学术思想的评价是极低的。在钱穆看来，清代学术思想的演变不是“每转益进”，而是“每转益退”！这与政治视角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就此而言，钱穆比章太炎更激进。运用同样的理论，研究和解释清代的学术和思想，却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究其实质，则在于钱穆与章太炎对中国传统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有根本性的理念差异。

一、“每转益进”还是“每转益退”？——钱穆对清代学术思想演变的基本态度

1942 年，48 岁的钱穆发表《清儒学案序》，回顾“吾国家民族文化绵历，迄五千年不弊”且为之“潜持而默运”的中心力量——“儒家思想”——从“先秦百家”，到汉唐“经学”，再到宋明“理学”的演变时，提出“每转益进说”，曰：

> 抑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此每转益进之说也……至于理学，自有考亭、阳明义蕴之阐发，亦几乎登峰造极无余地矣。又得晚明诸遗老之尽其变，乾嘉诸儒之纠其失，此亦途穷当变之候也……然则继今而变者，势当一切包孕，尽罗众有，始可以益进而再得其新生。明遗之所以胜乾嘉，正为晚明诸遗老能推衍宋明而尽其变，乾嘉则意在蔑弃宋明而反之古。故乾嘉之所得，转不过为宋明拾遗补阙。至于道咸以下，乃方枸枸焉又欲蔑弃乾嘉以复宋明，更将蔑弃阳明以复考亭，所弃愈多，斯所复愈狭，是岂足以应变而迎新哉？③

这是钱穆提出的学术思想正常演变的法则。丘为君对钱氏此说的解释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每一次大转换，都是一种进步与进化。而清代思想的发展与变化，在他看来，也应该作如是观。”④ 丘氏的解读，前一句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后一句。在钱穆看来，清代思想的发展与变化真的是“进步与进化”吗？

不用罗列其他证据，谨就这段“每转而益进”之说对清代不同时期学术思想的评判，就很难得出丘为君的结论。如对于宋明理学，乾嘉诸儒虽能“纠其失”，但较之晚明遗老能“尽其变”而言，已大大不如，退步弥甚，只是“为宋明拾遗补阙”。钱穆解释说：“明遗之所以胜乾嘉，正为晚明诸遗老能推衍宋明而尽其变，乾嘉则意在蔑弃宋明而反之古。”至于道咸以降的清

---

①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第十二”，《检论》卷 4“清儒”，《章太炎全集》第 3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55、473 页。

② 张瑞龙：《学术与世变：20 世纪上半期清学史论述的形成与演变》，《齐鲁学刊》2014 年第 2 期。

③ 钱穆：《清儒学案序》，原载四川省立图书馆编辑：《图书集刊》第 3 期（1942 年 11 月），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0 年，第 366-367 页。

④ 丘为君：《戴震学的形成》，第 236 页。

儒之学，更是每况愈下，称其为“所弃愈多，斯所复愈狭”。故在钱穆看来，清代学术思想的演变，不仅不是“每转益进”，反而是“每转益退”！这恰与丘为君的解释相反。

虽然，在《清儒学案序》的开头，钱穆也说：“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则清代乾嘉经学考据之盛，亦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岂得据是而谓清代乃理学之衰世哉？”[①] 这显然是针对章太炎对清代学术的论断而发，所谓“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②] 对于钱穆的这一说法，我们要仔细辨析，不能因为这是一句反问式的表述，就简单地理解为把它的意思反过来说，就是正解——因为“乾嘉经学考据之盛”，所以清代不是理学“衰世”。

首先，“乾嘉经学考据”并不代表整个的清代学术，故对于清代是不是理学衰世的判断，并不能以乾嘉经学考据来衡量。其次，“乾嘉经学考据之盛”虽是“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但对于它的发展是否健康、正常，此处没有明言。因而这只是事实判断，不是价值判断。最后，“乾嘉经学考据”以外，清代学术是否还有其他的学术时段和学术内容，用来判断清代是不是理学的衰世？

《清儒学案序》接下来正是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他说，“清代理学，当分四阶段论之”：“一曰晚明诸遗老”，“其次曰顺康雍”，“又其次曰乾嘉”，“又其次则曰道咸同光”，并对于每一阶段的理学，做了述评。[③] 亦即衡量清代是不是理学衰世，不是以乾嘉经学考据来判断，四个阶段或四个时期的理学分别代表了清代理学发展的不同水平和形态。

在这四个阶段的理学中，以“晚明诸遗老”的理学水平最高。乾嘉时期的理学，虽然“所得在经籍之沉浸”，对于宋明理学能“弥缝其缺失”，“补宋明之未逮”，但也只是“为宋明拾遗补阙”，远不能与晚明诸遗老相比。因为晚明诸遗老不仅能“为理学旧公案做最后之论定”，更能“自超于理学旧习套而别辟一崭新之蹊径”。也就是说，晚明诸遗老为理学开出一片“新天地”！而且“不治晚明遗老之书，将无以知宋明理学之归趋”。至于“顺康雍”的理学，则“与朝廷之刀锯鼎镬更施迭使”，沦为“压束社会之利器”。“道咸同光”时期，虽“经世致用之志复切”，“几几乎若将为有清一代理学之复兴”，但“较之明遗与乾嘉皆见逊色……若稍稍愈乎顺康雍之惨沮郁纡则已耳”。[④]

从钱穆对清代这四个阶段理学水平的分析和评判来看，清代学术思想分明是每转益“退”，而不是每转益“进”。所谓“道咸同光”较“乾嘉”和晚明诸遗老“皆见逊色”，而晚明诸遗老又“胜乾嘉”，至于“顺康雍”的理学更无法与晚明诸遗老相比。这是一个有非常清晰的时间线索，而且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学术退化。

丘为君特别关注钱穆对乾嘉考据学的负面评价，称：“在钱穆看来，走‘排它主义’的乾嘉考据学，其路途不是愈走愈宽，而是愈走愈窄。钱宾四认为，乾嘉考据学的基本精神在于打击与蔑弃宋明理学……它不仅未能继承宋明理学的精华，所获得的还可能是宋明所不要的残渣。”也注意到钱穆对道咸以降清代学术的评价并不高，说：“钱穆也反对道光咸丰年间之后的反考证学的‘程朱儒学复兴运动’，他以为这种蔑弃乾嘉以复宋明的‘排它主义’做法，与考证学的狭隘作风无异”。[⑤]

但问题就在于，符合“每转益进说”的清代学术思想，只有晚明诸遗老之学。既然如此，又怎能说在钱穆看来“清代思想的发展与变化”也是“一种进步与进化”呢？关键是，钱穆对清代学术思想阶段的划分，“晚明诸遗老”之后是“顺康雍”，然后是乾嘉和道咸同光。如果仅

---

① 钱穆：《清儒学案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 365 页。

②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第十二”，《章太炎全集》第 3 册，第 155 页。

③ 钱穆：《清儒学案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 365–366 页。

④ 钱穆：《清儒学案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 365–366 页。

⑤ 丘为君：《戴震学的形成》，第 237–238 页。

以晚明诸遗老之学来代表清代学术思想，就会造成一个这样的事实：还没有进入清代或刚刚进入清代，清代的学术思想就已经结束了！果真如此，那所谓清代的学术思想，就只是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判断了。

如何解释这一矛盾？钱穆为什么会对清代理学或清代学术思想的演变，有这样一个“每转益退”的观点或评判？换言之，在钱穆看来，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是健康、正常的吗？

二、钱穆论清朝政权的属性与政治视角下的清代学术思想

钱穆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最为人熟知的一点是以宋学为坐标和价值尺度，来衡量和评判清学，所谓“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①] 但我们似乎忘了，钱穆所谓“宋学”，有一主要组成部分，就是“政事”，或者说是政治。如称“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其论清代学术之导源于晚明东林者，其重要一端也是东林对政治之清议，而发为清初晚明诸遗老之“政论”。[②]

可见，钱穆从宋学论清学，本身就包含了政治这一重要因素，但是我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从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纯学术角度来定义宋学和清学，误认为是从学术自身的发展讨论清代学术思想的演变，忽略了钱穆看重的政治因素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故此处将其单独拈出，结合钱穆对清代政治的研究和评论，探讨其论清代学术思想之变迁。简言之，政治视角是钱穆论清代学术思想演变的另一重要视角，它甚至左右了钱穆对清代学术思想的价值判断。

关于政治视角与清代学术思想的演变，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多有阐发，且多寓有现实抗日之意。[③] 但是抗战胜利后，这种现实关怀已不复存在，钱穆论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却仍极重视政治视角。这就提醒我们应从学理的层面探讨政治视角在钱穆论述清代学术思想演变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钱穆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一种“士人政权”，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就是“政权该交付与读书人”，他们“读圣贤书，讲修齐治平之道，由国家加以考试，量才录用，此辈读书人的意见，就可以代表全民”。科举制度的“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就是“开放政权”。[④]

但是，像元朝和清朝这样的征服王朝，他们的政权却不是开放的，都是“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就是部族政权。“只有部族政权，才始是把另一批人来代替读书人，那便是元代的蒙古人与清代的满洲人，他们才始是当时政权的实际掌握人”，“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⑤] 这是一种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的政治，没有远大的理想和追求，只是为了能更好地控制政府和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政权不会真正的向士人开放。

“部族政权”和“士人政权”，在政治理论和统治理念上，是天然对立的。一个是为了现实的某一部族的利益，一个是为了理论上或理想中的全民利益。二者政权的属性或性质不同，即主权在民还是在某一部族。

对于部族政权而言，最需要提防的，正是这些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中应该掌握政权的“读书人”。部族政权维护统治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压制读书人，防止他们攫取政权。由于部族政权抱有这样一种“政权之私心”，为达到这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没有公开的制度，只有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 页。
②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7、16−20 页。
③ 张瑞龙:《学术与世变：20 世纪上半期清学史论述的形成与演变》,《齐鲁学刊》2014 年第 2 期。
④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 144−145、56−57 页。
⑤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 143、145 页。

秘密的法术。[①]

这些统治术在清代达到了最高峰，所谓“清室对待汉人，无论其为怀柔或高压，要之十分防猜”。[②] 从表面上看，清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但却“另用一种法术，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③] 于是，原本是“开放政权、选拔真才”的考试制度，在清代就变成一种“愚民政策”。因为“清代的部族政权，既绝无意于把政权开放，则考试只成为羁縻牢笼之一术”，“他们开科取士……表示开放政权……但实际上则另有一套办法防制你。如每一衙门满汉夹用，外省督、抚，则多用满人，少用汉人等”。[④]

为了压制汉人士子，维护满人的统治地位和利益，清廷甚至不惜刻意造成不同族群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裂，亦即“清代统治中国的传统政策，一面钳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⑤] 具体说来就是：“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压迫中国。一面在羁縻中国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又一面是压迫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这样三方面用心，可谓是很周到的。”[⑥]

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不同族群和不同阶层之间隔阂的消泯和融合，才是健康、正常的发展道路。[⑦] 但部族政权为了维护其统治的一己之私利，竟然人为地造成国家和社会的各种分裂，这些分裂无论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都是一种退步。它使得国家和社会非但不能上下同心同德，反而因此大量消耗内部的生机和活力，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这种统治方式及其塑造的社会结构，也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更与宋明理学“一道德、同风俗”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

这些都是清朝“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出发”，“便利他们统制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他们“存心压迫知识分子”，“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无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出版自由，而还不断有十分可怕的文字狱”，“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⑧]

掌握政权的满人，不但不会与汉人中的读书人同心同德，反而会对其提防、猜忌。汉人以“致君尧舜上”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对待满洲君主，无异于与虎谋皮，令其心生警惕。这也就是乾隆帝所说的：“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因而在清朝统治下，儒家思想即使有所谓的发展，也只能是畸形的、扭曲的发展：“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其为人高下深浅不一，而皆足以坏学术、毁风俗而贼人才。”最终受害的，还是天下万民，国家统治也不会有太好的发展。所以在钱穆看来，清代的统治，即使是康雍乾盛世，也只不过是“幸而差安”的局面，至于嘉庆以后，更是“终不免于大乱”的衰乱之世。[⑨]

从学理上厘清这些基本观念后，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钱穆在不同时期对清代学术思想发展的论述，都有一个根本性的立场，就是政治视角。在钱穆心目中，清代学术思想是满人统治下中国传统学术或儒学思想畸形发展的结果。那么，健康、正常的或者说理想中的清代学术思想形态应该是怎样的？

---

①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 148–151 页。
②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830 页。
③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 145 页。
④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 158、162 页。
⑤ 钱穆：《国史大纲》，第 862 页。
⑥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 162 页。
⑦ 钱穆：《国史大纲》，第 786、793–794、812 页。
⑧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 154、162–163 页。
⑨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第 2–4 页。

三、钱穆论清代学术思想的理想与现实——清初与乾嘉学术

钱穆理想中的清代学术，是“直承晚明而来”的清初晚明诸遗老之学。[①] 在他看来，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理想的学术形态。1928 年，钱穆发表《述清初诸儒之学》，称其“有理学家之躬行实践，而无其空疏；有朴学家之博闻广览，而无其琐碎”。他说：“宋明诸儒，专重为人之道，而乾嘉诸儒则只讲读书之法。道德、经济、学问，兼而有之，惟清初诸儒而已。”不仅如此，在学术精神上，清初晚明诸遗老“行己持躬，刻苦卓励，坚贞不拔之概，尤足为百世所仰慕”，“要而言之，则‘厉实行’、‘济实用’之二语，盖足以尽之也”，“笃学博闻，能措之世用，与空谈心性及溺意训诂考据者异其趣”。[②]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穆反对梁启超以顾炎武为清代学术鼻祖，而是将黄宗羲推为清代学术的开山。钱穆认为黄宗羲“欲推学术、事功而一之，不仅儒林、文苑、道学之合辙而已”，黄氏倡导的“儒之大全”的学问，“将以经史植其体，事功白其用，实践以淑之身，文章以扬之世”，“以博杂多方之学，融成精洁纯粹之知。以广泛之智识，造完整之人格。内外交养，一多并济”，“其意趣之闳大，规模之恢伟，固足以掩顾、颜而上之矣”。而顾炎武倡导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则将“学、行分成两橛”，“是‘博学’为一事，而‘行己’又为一事”。这从黄宗羲的论学立场来说，正是他所批评的“读书多而不反求之心，仍不免为俗学”。[③]

1940 年，钱穆在其出版的《国史大纲》中赞誉晚明诸遗老，“北宋诸儒无其刚毅，东汉诸儒无其博实”，称其治学为人“刻苦、坚贞、强毅、笃实、博综”，“有体有用，形成多方面圆满完整之人生”，并由此断言清朝初年“实中国学术史上一段极有光辉之时期”。[④]

1959 年，钱穆毫不掩饰其对清初晚明诸遗老的歆慕之情，坦承：“我个人对这一时期的儒风最为向往和崇拜。”他说：“倘使我们要选择一最合我们标准者……我想应是晚明……明亡后，学者亲历亡国之痛……但绝处逢生，遂产生极伟之学术”，“其人虽隐沦不出，但仍在讲治国、平天下，讲经纶世业，其学却极端积极，此乃晚明儒之特别处……清人入主后，此批学者不可能再于治平之业上发扬其光辉……明末诸儒因对历史作一大反省，故其学博大精深……坚贞刻励，蔚为时风，故晚明儒者最值得我们之崇拜”。[⑤]

但是这种理想的学术形态，学术上的多元发展之途，政治原理上的究根探本之论，却在清代部族政权的高压统治下，被逐步消磨、隐没，转而成为乾嘉经学考据。对此，钱穆在 1947 年发表的《论清儒》中就直言：“经学不是清儒自己要走的路。”[⑥] 对于乾嘉经学考据，钱穆的评论是：“多耗于文字之考释……并不能着意于人伦日用之力行”，“非固有悲天悯人之志、担当天下之意”，“始终不脱读书人面目”，“只格得六经书本上名物”，称：“三百年来学术大体，要之不能脱‘尊圣信古’之一见。”[⑦] 他对比宋人、晚明和清人学术的差异，评论说：“宋人讲心性之学，晚明讲治平之学，清人讲训诂考据之学，渐至于个人、社会毫无关系。”[⑧]

对于这种学术形态，钱穆的判定是“变了质”“受了病”的学术。他说：“清儒的经学，其

---

① 钱穆：《论清儒》，《中央周刊》第 9 卷第 3 期（1947 年 1 月），第 5 页。
②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22 册，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 年，第 1、3 页。
③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32–34 页。
④ 钱穆：《国史大纲》，第 852 页。
⑤ 钱穆：《讲堂遗录 · 明清学术思想》，《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52 册，第 224–226 页。
⑥ 钱穆：《论清儒》，《中央周刊》第 9 卷第 3 期（1947 年 1 月），第 6 页。
⑦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75、348–349、506 页。
⑧ 钱穆：《讲堂遗录 · 明清学术思想》，《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52 册，第 250 页。

实仍还是一种史学，只是变了质的史学，是在发展路上受了病的史学。”清儒“不敢批评经籍本身，却批评经学的一切版本形式与文字义训……尤其是与人生义理与教训无关的方面”，“清儒经学则只有学究气，更无儒生气。总之是不沾着人生……他们的治史，亦只为史书做校勘整理工作，却不注意史书里面所记载的真实而严重的人事问题。清代学风，总之是逃避人生”。①

不仅如此，乾嘉经学考据还是清朝汉文化分裂政策的体现。② 钱穆认为清廷虽然尊崇朱子，但只是表面上的，因其对程朱理学中主要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极端排斥”，“绝不愿学者认真效法程朱，来与闻他们的政权”。如四库馆臣对程朱宋学“均滥肆谩骂”，以“逆探朝廷意志，而为奉迎”。另一方面，清廷又“推波助澜，假意提倡江、浙考证之学，务期学者只埋头不张眼”。③ 这就造成在清朝的官方层面，汉学与宋学的并存和对立。

在民间，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诸儒反程朱理学，也是清廷高压统治的结果。钱穆说：“清代学者反对朱子，实为反对清廷尊崇一家以钳天下之口。”④ 在他看来，“乾嘉诸老对当时统治权之敌意，亦以攻击宋明儒为发泄”，因为此时的宋明儒学“为上层统治阶级所利用”，“他们对政治的统治者不能正面发泄，遂使他们的攻击目标，转移到宋儒身上”，“责备宋儒理论为上层统治者张目，作护符”。他称“清儒此种对于传统权威之反抗精神”，是“求平恕，求解放”，是“同情弱者，为被压迫阶层求解放，还是一种平民化的呼声”。⑤

这些学术分裂的事实和清廷的汉文化分裂政策，还会极大助长一种不良的学术风气，就是极深的门户之见和学术上的“排它主义”。这也导致清代学术思想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正常演进之路相悖，所谓乾嘉诸儒“蔑弃宋明而反之古”，其所得“转不过为宋明拾遗补阙”，道咸以降“乃拘拘焉蔑弃乾嘉以复宋明，更将蔑弃阳明以复考亭，所弃愈多，斯所复愈狭”，不仅不是“每转益进”，反而是“每转益退”！

尽管钱穆认为最理想的清代学术思想形态是清初晚明诸遗老之学，但学界通常认为乾嘉经学考据才是清代学术思想的典型代表。即使是钱穆本人的《论清儒》一文，其主要内容也不得不以乾嘉诸儒的学术思想为中心来论述。不过，此文后来以《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以下简称《新天地》)为题重新刊载，而且收录在钱穆晚年汇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难道是钱穆晚年对乾嘉经学考据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变化，以至于用“新天地”这样的字眼来定位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四、《论清儒》的三个版本与钱穆对清代学术思想的“晚年定论”

钱穆《论清儒》一文原载 1947 年 1 月南京《中央周刊》第 9 卷第 3 期，但这一版本并没有在学界广泛流布。反而是它改题为《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的版本，因收录在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而在学界影响巨大。

学界或认为这篇《新天地》是钱穆对清代学术思想的重要论断，或认为是《论清儒》原本秉持的意旨和观念，此时以更加鲜明的标题予以揭示。但我仔细比勘这两个文本，发现其内容本身就存在重大差异，关键是《钱宾四先生全集》收录最后发现的改文，不但标题改为极其平淡的《略说乾嘉清儒思想》(以下简称《略说》)，而且内容文字也有重大改动。而这三个版本的最大异同，就是《新天地》一文开头论述“前期清儒为思想界所拓之新天地”一大段文字的增

① 钱穆：《论清儒》，《中央周刊》第 9 卷第 3 期 (1947 年 1 月)，第 5 页。
②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4-10、17-18、35-36 页。
③ 钱穆：《国史大纲》，第 860-862 页。
④ 钱穆：《讲堂遗录 · 明清学术思想》，《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52 册，第 252 页。
⑤ 钱穆：《论清儒》，《中央周刊》第 9 卷第 3 期 (1947 年 1 月)，第 7 页。

删与否。其他细微之处的文字改动，也与此密切相关。

由于此文攸关钱穆对清代学术思想的认识与定位这一重大问题，目前尚未发现学界有人论及，故此处略加考订辨析。1962年3月台湾《新天地》第1卷1期重新刊载钱穆《论清儒》一文，但内容、文字却多有改动。其中最大的变动，就是篇名改为《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而且在文章开头增加了一大段论述“新天地”的文字。就此而言，似乎钱穆对于乾嘉诸儒所代表的清代学术思想，曾有一积极的评价，称其为思想界“开拓了一片新天地”。而且1979年85岁的钱穆在汇编《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最后一册时，仍然收录了增订后的此文，而非1947年的原本《论清儒》。

但1992年在钱穆遗稿中发现了这篇文章的改本，不但题目已改为《略说乾嘉清儒思想》，而且文章开头增写的一大段也被全部删去。1998年台北联经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和2011年北京九州出版社《钱穆先生全集》新校本《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收录的都是最后的改本。

与前两个版本相比，钱穆在这篇最后改稿的行文中，每遇“清儒”，往往加上“乾嘉”二字，以示限定。如论清代政治高压下晚明诸遗老的学术和无可寄托的心情，“心情变了，学术如何能不变？”此句后面的文字，《论清儒》作“但清儒亦并没有大气魄人来领导此学术之变”，《新天地》改为“但此下没有大气魄人来领导此学术之变”，《略说》改作“但清儒即晚明诸遗老以下，乾嘉时代的清儒亦没有大气魄人来领导此学术之变”。再如，前两个本子中的“清代学风，总之是逃避人生”，在最后的改本中则成为“清代学风，即乾嘉时代的学风，总之是逃避人生”。其他如“清儒则对人生好唱低调”“清儒反对宋学”“清儒此种对于传统权威之反抗精神”“清儒学风”等表述，最后的改本中也都改“清儒”为“乾嘉清儒”。①

钱穆修改这些的目的，显然是要他把最心仪、最倾慕的清初晚明诸遗老之学排除在外，以免误会此文是对清代学术特别是对清初晚明诸遗老之学的评价。因为在钱穆对清代学术思想的划分中，晚明诸遗老之学也是清代学术思想的组成部分。前引钱氏《清儒学案序》，对此已有明确表述。钱穆也明确讲过，他所称誉的晚明诸遗老，正式从事学问都在30岁以后，其时已处于清朝统治时期。②

关键还在于，《新天地》的评价和定位，是钱穆评论晚明诸遗老之学的。在《论清儒》的三个版本中，都有对晚明诸遗老的评价，说他们遭遇“学术上的穷途”，不得不转身向外，重找“新天地”，称晚明诸遗老的史学，是一种“新圣学”或“新理学”。③ 钱穆《中国思想史》称晚明诸遗老“为此后中国学术思想界另辟一新天地”，也是如此。对比《论清儒》等文本，不难发现钱穆对清初晚明诸遗老之学的推崇，终其一生是一以贯之的。换言之，钱穆是不想把“新天地”这一本是他给清初晚明诸遗老学术的定位和评价，让人误以为是对清代学术，特别是对乾嘉清儒的评论。

那么，《略说》有没有可能是对《论清儒》一文的改定，而不是在《新天地》基础上的修改？笔者仔细比勘过三个文本后，已排除了这种可能。因为《新天地》对《论清儒》的诸多文字删改，《略说》一文都已吸收、遵循，而且与《新天地》一文相比，除删去最前面的一大段文字外，在内容和文字上的主要修改，也往往是在“清儒”之前，加上“乾嘉”，称为“乾嘉清儒”。显然，这确实是最后的定本。根据整理者描述，《略说》是发现的最后的改文。

这三个版本的文字异同，提醒我们钱穆晚年对于乾嘉诸儒学术思想的评价，仍与早年相同，

---

① 钱穆：《论清儒》，《中央周刊》第9卷第3期(1947年1月)，第5-7页；钱穆：《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3-10页；钱穆：《略说乾嘉清儒思想》，《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5-17页。

② 钱穆：《讲堂遗录·明清学术思想》，《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2册，第230页。

③ 钱穆：《论清儒》，《中央周刊》第9卷第3期(1947年1月)，第5页；《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6页。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至于《新天地》一文，则是一个过渡性的文本，与钱穆平生对于乾嘉诸儒的评价并不相符，甚至不排除是为《新天地》杂志之创刊而改作的“应景”文章，是一时的权宜之举。但问题在于，这篇与钱先生平生论学宗旨不太相符的文章，为何会收入他晚年亲手汇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而在学界广为流布？

细读钱穆为此册《论丛》所作之“序”，或可揭开这一谜团。“序”云：“此为余汇编《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之最后一册……余患双目不能见字，及今已近两年。此编各稿皆由及门何君恒代为搜集，又代校字；积年陈稿，已不能亲读一过，一仍其旧，未能续有所改定。”① 即钱穆当年汇编此册《论丛》时，因为身体健康的缘故，并未能对此所收录的文字有所校读、改定，而是由弟子代为搜集、校对。按惯例，当以最后发表的文本为准，故收录了这篇与其平生论学宗旨不太相符的论文，并且作为该册《论丛》的第一篇。

或许也是因为这一缘故，当钱穆晚年在眼疾有所缓解时，又对此文“有所改定”。改定后的文字标题和内容，也更能体现钱氏的原意及其一生的学术立场，堪称钱穆对清代学术思想的“晚年定论”。但遗憾的是，钱先生这一最后的改稿，尽管早在1998年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中已首次公布、出版，2011年九州出版社《钱穆先生全集》新校本《中国学术思想论丛》(八)也据以收录，却至今仍未引起学界的关注。于此亦可见，文献的版本比勘和考订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五、余论

钱穆认为，明清之际中国学术、思想和政治最理想的发展方向，就是沿着清初晚明诸遗老开辟的“新天地”走下去，因为晚明诸遗老“对中国传统文化、政治、教育各个方面都想从头有一番仔细的认识”，“是理智的、社会的与史学的”。② 对此，他也曾明言：“倘使清代开基仅有二三十年，则《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等书，确可作为当时政治、经济上之参考准则。” ③ 但由于“满清的部族政权，很快安定下来”，而且统治260余年，清代学术思想也因此畸形扭曲，从未获得健康、正常的发展。

清代的部族政权性质，在统治理念和统治精神上，排斥和提防士人参与政治，与中国传统“士人政权”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因后者要避免使政权沦为某个族群私利的统治工具，故对外反抗异族征服，对内开放政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既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就不存在政权的归属性纷争，如此便可致君泽民。

传统儒家政治思想中所以极重《春秋》夷夏之辨或夷夏之防，正是有着这方面的深刻意涵。宋代理学在此方面更有长足的发展，故宋学的这些政治理想，也与征服王朝的部族政权属性相冲突。因而钱穆以宋学为坐标和标准讨论清代学术思想，在政治方面，更不应忽略这一层意涵。

由于清朝统治的政治高压，清人对《春秋》夷夏之辨极少有讨论，或即使有所讨论也极少能流传下来，故钱穆未能多加论列。但他对此仍极为敏感，且高度关注。如评论龚自珍的《春秋》学，就说：“定庵治《春秋》，知有变法，乃不知有夷夏。”并引龚自珍批评宋明儒者“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的言论，评论清朝统治“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狝既夷”，即使衰象已见，但龚氏本人“方治《春秋》，而犹不敢游思及于夷夏”。④

---

①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序”，第1–2页。
② 钱穆：《论清儒》，《中央周刊》第9卷第3期(1947年1月)，第5页。
③ 钱穆：《讲堂遗录·明清学术思想》，《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2册，第254页。
④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14页。

处在清朝的高压统治下，最无奈的选择只能是逃避人事，不预闻政治，更好一些的，就是发出自己反抗的声音，反抗统治权威，为被压迫阶层求解放。否则积极与统治者合作，助纣为虐，但这反而会遭统治部族的猜忌，随时面临不测之祸。这也是钱穆对康有为及其维新变法评价极低的原因所在。

钱穆对清代学术思想的演变，有一个总体性的评价："清儒学术，曲折纡回，始终未获一条正当的直路。"① 这是他基于宋学的立场评论清代学术思想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钱穆所论的"宋学"，"政事"居其半，已包含了从政治角度衡论清代学术思想的视角。学术不能独立于政治，学术的终极目的是经世致用，学术影响政治的极致，就是道统规约治统，反之则为害学、害政。所谓"若舍经术而专言经世，其弊有不可言者"。②

在钱穆看来，清代学术思想如果有所谓的"正面价值"，可能在于它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鲜活的负面榜样。在异族统治下，士人的思想和学术精神如何一步步地消磨、扭曲，乃是积非成是，以是为非而不自知。他对清代学术思想评价的基本态度，也是"每转益退"，而非"每转益进"。故钱穆提出的中国学术思想自然演进的"每转益进说"，对于清代学术思想的演变而言，这一法则并不适用。

这些都迥异于章太炎。章太炎对于清代学术思想的价值和贡献颇为称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去政治化"，所谓："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征其文明"，"其务观世知化，不欲以经术致用，灼然矣！"③ 章太炎甚至在此基础上得出一个惊人的论断，即学术的真正发展正在于朝廷的漠视甚至打压，朝廷的积极提倡反而会危害学术的发展，说："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凡朝廷所闿置，足以干禄，学之则皮傅而止……恶朝廷所建益深，故其自为益进也……利禄之途，使人苟偷，何学术之可望？"④

但在钱穆看来，儒家精神的实质，正在经世济民。学术疏离现实，没有时代精神，学者不关心当下，不关心民生政治，既不是儒家的真传统，也不是宋学的真精神。一个时代的学术，除了其学问层面的东西，更重要的还有附丽在这种学术上的精神，这才是完整的、健康的学术，如果剥离了这种精神，仅剩下那种单纯的、孤零零的学问，这种学问也就不成其为真学问了。没有经世精神，没有现实关怀的学问，不是儒学真谛，是特殊的环境、扭曲的时代、被压制的异常环境所致。

这与章太炎所论清代朴学者在政治高压下的主动疏离政治，反而推动了学术的真正发展，截然不同。故章太炎对清代学术的评价是乐观的，认可的；钱穆则是悲观的，不认可的。就清代学术思想研究中的"政治高压说"而言，钱穆比章太炎更激进。章太炎赋予其非暴力不合作、守先待后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钱穆则就此做出价值判断，认为清学是畸形的，并且完成学理上的建构，将其作为从宋学论清学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政治关怀，这既是宋学中居其半的"政事"，也是宋学中极为重视的《春秋》夷夏之辨。

关于传统中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近代以来由于受西方观念的影响，我们往往从纯学术的观念去思考、定位或定义传统的中国学术，甚至在价值观上，也是如此判断。但是，确如黄振萍所说，在传统中国，学术、思想与政治不仅仅是彼此缠绕且纠葛不清的关系，更是一而二、二而一，是一体的。如经学施之于学术则为经术，施之于政治则为政术。独立的学术和思想是近代西方科学昌明之后才出现的，是近代科学主义的产物，和政治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疏离。

---

① 钱穆：《论清儒》，《中央周刊》第 9 卷第 3 期（1947 年 1 月），第 3 页。

②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653 页。

③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第十二"，《章太炎全集》第 3 册，第 158、161 页。

④ 章太炎：《与王鹤鸣书》，《章太炎全集》第 4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52–153 页。

在传统中国，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学术和思想并不多见。①

因而对于钱穆这样一位论学注重特别政治关怀的学者来说，如果仅从纯学术的角度去探讨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显然不是探骊得珠之举。不仅如此，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亦应注重其与政治纠葛的复杂特性。钱穆说："中国学术，显亦有其独特性……今国人一切以信奉西方为归，群遵西方学术成规，返治中国传统旧存诸学，精神宗旨既各异趋，道途格局亦不一致。必求以西方作绳律，则中国旧学乃若不见有是处。抑且欲了解中国旧学，亦当从中国旧学本所具有之精神宗旨、道途格局寻求了解，否则将貌似神非，并亦一无所知。"② 这对于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近代西方的纯学术立场研究传统中国学术研究者而言，不啻为警醒良药。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黄兴涛教授提供的宝贵修改意见！）

References

Ge Zhaoguang. "Qingdai xueshushi yu sixiangshi de zai renshi" (Rethinking the academic history and the thought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Zhongguo dianji yu wenhua* (Chinese Classics and Culture) 1 (2012).

Qiu Weijun. "Qingdai sixiangshi yanjiu dianfan de xingcheng tezhi yu neihan" (The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 of the study model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in Qing Dynasty), In *Daizhen xue de xingcheng* (The formation of Dai Zhen science), Beijing: Xinxing chubanshe, 2006, pp.212−264.

Zhang Ruilong. "Xueshu yu shibian: 20 shiji shangbanqi qingxueshi lunshu de xingcheng yu yanbian" (Academy and transformati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Qing academic history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Qilu xuekan* (Qilu Journal) 2 (2014).

The Political Perspective and Qian Mu's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Thought in Qing Dynasty

ZHANG Ruilong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zhangruilong08@ruc.edu.cn)

Abstract: Qian Mu's studies of academic thought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to judge and review Qing Xue with Song Xue as the coordinate and value scale. However, we often define Song Xue and Qing Xue from a purely academic viewpoint in the modern western sense, mistaking them for academic perspectives. In fact, in Qian Mu's so-called "Song Xue", politics accounts for a half, which already contains the perspective of reviewing the academic thought of Qing Dynasty from a political point of view. "Every turn is beneficial to progress" was the rule of the normal evolution of Chinese academics, but the academic thought in Qing Dynasty was "every turn is detrimental to progress". The newly discovered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versions of Qian Mu's *On Qing Scholars* support this assertion. Qian Mu is more radical than Zhang Taiyan concerning the political perspective in the study of academic thought in the Qing Dynasty, which takes the political perspective as an internal part of judging Qing X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ng Xue and completes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t was the distinctions of Chinese and barbarians stat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hich was highly valued by Song Xue.

Keywords: Qian Mu, History of Academic Thought in Qing Dynasty, "every turn is beneficial to progress," political perspective

---

① 黄振萍、高波、姜萌：《在清朝发现清朝——〈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的政治、学术与社会〉对谈录》，《中华读书报》，2014年11月5日，第5版。

②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序"，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第1–2页。